



土耳其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内涵、动力及影响^{*}

邹志强

[摘要]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大国之间的矛盾与争夺加剧,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复杂化。土耳其加速“回归中东”,积极塑造大国地位,实行更为强硬和安全化色彩浓厚的地区外交政策。土耳其借助介入地区争端、建立军事基地、扩大安全合作等形式稳步扩大了在东地中海、海湾、红海—非洲之角这三个中东核心次区域的政治与军事存在,提升了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正在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对中东地区热点问题、地区格局与大国关系带来复杂影响。

[关键词] 土耳其;中东;地缘政治;地缘战略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8)06-0016-06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8.06.003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地区大国博弈加剧,阿拉伯国家地位下降,伊朗、土耳其等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地位更加凸显。无论是初期因积极推广“土耳其模式”而带来的光环效应,还是后期在大国之间闪转腾挪、积极大胆地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土耳其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貌,在巴以问题、叙利亚危机、卡塔尔断交危机等一系列地区热点事务中表现活跃,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重要角色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的中东外交不仅表现为政策态度上的强硬作风,也日益倾向于使用硬实力强势而为,积极主动甚至带有冒险性地塑造对本国有利的地区地缘环境,提升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力争成为正在转型的地区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甚或领导性角色。

一、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新态势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陷入反复动荡与秩序混乱之中,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持续进行战

略收缩,干预地区事务的意愿明显不足,致使中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纷纷爆发并持续得不到解决或缓解。在外部霸权力量相对缺失、内部多强并立的地区格局下,中东地区格局的动荡不安引起地区大国的激烈争夺,无论是争夺安全优势还是解决安全焦虑均反映出地区安全议题已高度凸显。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大国前所未有地竞相介入地区冲突与热点问题,并将自身利益和相互间矛盾带入这些地区冲突与热点问题之中,夹杂了教派、民族等复杂因素的地缘政治博弈愈演愈烈。地区中小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被动选边站队,卷入不同方向和层次的地缘政治博弈之中。中东地区格局的脆弱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及国内派系之间的三层复杂博弈在很多国家持续上演,影响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演变。七十年来,中东地区从未像今天这样由于大国之间争夺地区控制权及其代理人冲突而紧密联系在一起。^[1]在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的进程中,地区大国的主体性日益突出,并主要

^{*} 本文系上海市哲社规划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合作机制研究”(2016BGJ001)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大国的国际产能合作研究”(2018T110328)的资助。

在中东三大次区域激烈展开。

第一,从博弈主体来看,当前中东地区大国沙特与伊朗、土耳其等国之间的利益日益对立化、地缘政治争夺长期化。中东地区大国都拥有各自的大国梦想,纷纷借助局势变动而主动出击,但因利益冲突而相互碰撞,矛盾丛生。伊朗、沙特、土耳其三国表现尤其突出,成为近年来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参与者,以色列、埃及、阿联酋等国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中东的地缘政治对抗正在什叶派势力伊朗、逊尼派激进势力沙特阿拉伯和逊尼派温和势力土耳其三大力量之间展开。^[2] 地缘政治结构从阿拉伯国家主导转变为沙特、伊朗和土耳其三足鼎立,伊朗和土耳其日益深度卷入阿拉伯国家政治当中,且三国之间不仅存在权力之争,也具有浓厚的教派、意识形态竞争色彩。^[3] 一方面,地区权力真空和力量失衡使得部分地区国家蠢蠢欲动,借机扩张自身势力,如伊朗、土耳其;另一方面也使部分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上升,如沙特。利益扩张和安全焦虑都促使这两类国家加大对地区事务的介入,甚至采取更具挑衅性、风险性的地区政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必然加剧地区大国之间的对抗和博弈。沙特、伊朗、土耳其试图成为重塑中东地区格局的新角色,作为当今中东的“三驾马车”,其一举一动对地区发展与稳定有重大影响。当前区域内的大国博弈主要集中在土耳其、沙特和伊朗三国的博弈上,其中又以伊沙之间的战略竞争最为关键。^[4] 近来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对抗也逐步从幕后走到台前,呈现出日益扩大化的趋势。土耳其基于谋求大国地位、争夺地区主导权、解决国内库尔德问题等多重目标四面出击,在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穆兄会问题、库尔德问题、“伊斯兰国”问题上与多方存在矛盾和冲突,严重受挫,而国内政治与社会转型的危机也在不断加剧,^[5] 但其积极冒进的政策风格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第二,从博弈区域来看,东地中海、海湾地区和红海—非洲之角地区成为三大主要的次区域。东地中海地区存在旧有的巴以问题,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国内各派系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博弈强度有增无减。特别是地区大国将叙利亚作为相互博弈和对抗的前沿阵地,地区热点问题演变为地区大国之间的代理人冲突。海湾地区虽然大多数时候风平浪静,但由于沙特与伊朗这一对主要博弈对手的存在而暗潮汹涌,沙伊博弈更多地体现在叙利亚、也门等海湾地区之外。卡塔尔断交危机的爆发凸显了海湾次区域的地缘政治对抗和博弈,而危机陷入僵局持续得不到解决也反映了冲突

长期化的趋势。本来处于中东边缘地带的红海—非洲之角地区近年来热度明显上升,也门冲突僵局仍未打破,地区大国的军事部署不断增强。红海和非洲之角不仅地理位置关键,而且地区国家间关系复杂,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争相介入,多重矛盾快速叠加,紧张局势不断上升。近年来,沙特、埃及、土耳其、伊朗通过借助也门冲突、地区国家间矛盾和设立军事基地等方式在该地区展开了日益激烈的争夺;而地区外大国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纷纷在此设立军事基地和增强军事存在,多重矛盾叠加和交织在一起,使原本较为平静的红海地区成为中东地区的新热点。

当前,围绕地区热点问题,中东地区逐步形成了三组地缘政治博弈复杂交织的局面:一是美俄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二是沙特、以色列联合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三是土耳其、卡塔尔等现代伊斯兰阵营与沙特、阿联酋等传统伊斯兰阵营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

二、土耳其中东地缘三角战略的内涵与动力

近年来土耳其持续“回归中东”,战略重心加速向中东与伊斯兰世界转移,积极塑造大国地位,并将自身安全与中东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实行更为积极、更具风险性的外交政策。当下的土耳其将中东视为战略资产而非负担,加速了外交向中东回归的步伐。^[6]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的中东外交经历了从合作到冲突的转变,这也导致土耳其的中东地缘政治模式、话语与实践的“再安全化”。^[7] 从实践来看,土耳其的中东地区外交高调而积极,借助介入地区热点问题、设立海外军事基地、扩大安全合作等形式提升在中东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积极争夺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领导权。

近年来,土耳其稳步扩大了在东地中海、海湾和红海—非洲之角这三个中东主要次区域的政治与军事存在,试图把海湾地区的卡塔尔、红海地区的索马里和苏丹等国打造成主要战略支点,将之前已经存在的与卡塔尔、哈马斯的非正式联盟“小三角”进一步拓展为涵盖东地中海、海湾和红海的“大三角”,正在形成本国特色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

第一,土耳其通过介入叙利亚内战、支持哈马斯增强了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了在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和“回归中东”战略等因素的影响下,土耳其积极支持巴勒斯坦,特别是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不惜与曾经

的地区盟友以色列多次交恶,不断展示对以色列强硬和巴勒斯坦代言人的形象,以此塑造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土耳其领导人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高调支持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人物,也是哈马斯最重要的外部支持者之一。^[8]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冲击,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强烈呼吁下,2017年12月13日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兰堡召开特别峰会,发表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联合声明。^[9]埃尔多安宣布以色列是“恐怖主义占领国”、呼吁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努力塑造伊斯兰国家领袖的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叙利亚问题已经成为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焦点,加之涉及到本国切身利益的库尔德问题,土耳其一直保持对叙利亚问题的深度介入。土耳其既与西方、逊尼派国家合作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也与俄罗斯、伊朗形成务实合作联盟,同时也不惧单独开展军事行动,在保障本国安全这一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极力扩大在叙利亚这一事关中东地区格局走向问题上的话语权。2016年8月,土耳其发动“幼发拉底河之盾”军事行动,控制了叙北部约2000平方公里的地区,谋划建立“安全区”;2018年1月,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发起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以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为打击目标,^[10]两个月后成功控制了该地区。当前库尔德问题已成为土耳其对叙利亚政策的核心关切。^[11]阻止叙利亚库尔德势力的崛起和影响外溢成为土耳其的主要目标,而扩大在叙利亚及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是重要动因。

第二,土耳其通过与卡塔尔的政治、安全合作挤入海湾地区事务,成为沙特、伊朗之外的第三方势力。当前海湾地区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沙特与伊朗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对峙,随着伊朗及什叶派势力的上升,沙特一方的不安全感日益增强,特别是2016年1月沙伊断交以来,两国及其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本没有在海湾直接插手、发挥影响力的机会,但2017年6月5日爆发的卡塔尔断交危机给了土耳其新的契机。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与卡塔尔因为意识形态认知相通、共同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原因,结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甚至被称为“两个半国家的联盟”。^[12]卡塔尔断交危机发生后,土耳其一方面积极参与危机调解,呼吁通过谈判而非制裁解决争端,另一方面明确支持卡塔尔,提升了与卡塔尔的政治安全合作。土耳其不仅通过空运对卡塔尔开展食品等物质援助,还宣布向卡塔尔的军事基地增派军队,举行

联合军事演习,两国战略关系进一步提升。早在2012年,土耳其与卡塔尔就签署了军事训练协议,2015年两国正式签署了包含土耳其在卡塔尔驻军的军事合作协议。断交危机发生后,土耳其表示将尽快在卡塔尔部署本国军队,可能多达5000人。2017年11月,土耳其还与伊朗、卡塔尔签署协议,将伊朗作为土耳其与卡塔尔两国的贸易中转国。土耳其的偏袒举动及其军事介入动作遭到沙特等国的反对,其与沙特、埃及等国的关系更趋紧张和对立。沙特等国对卡塔尔提出的终止制裁条件之一就是关闭土耳其在卡塔尔的军事设施、终止两国军事合作,但土耳其并未理会,反而快速增派军队进驻卡塔尔,加剧了地区形势的紧张。

第三,土耳其通过在索马里设立军事基地、与吉布提和苏丹提升安全合作快速增强了在红海与非洲之角的军事存在。一是计划在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吉布提位于红海与非洲之角关键位置,迄今已有多国在此设有或有意设立军事基地。2017年12月19日,吉布提总统盖莱(Ismail Omar Guelleh)访问土耳其,宣布吉布提向土耳其开放部署军事基地,以保卫红海地区安全。如果最终实现,土耳其将成为第六个在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的外部大国。二是与苏丹达成安全合作协议,并租借红海沿岸岛屿进行经济开发。2017年12月25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苏丹,两国达成一项军事协议,计划建立战略合作委员会,大幅提升两国安全合作。同时,两国宣布达成土耳其租借苏丹红海沿岸的萨瓦金岛用于旅游开发的协议,土耳其计划投资重建该岛基础设施,振兴其旅游业,也将其作为土耳其、非洲等地穆斯林前往沙特朝觐的中转站,以复兴其历史地位。苏丹外长易卜拉欣·甘杜尔(Ibrahim Ghandour)表示,土耳其和苏丹已签订军事与安全合作协定,以共同建设基础设施、为军舰和商船共同使用该港口提供法律保障。^[13]三是在索马里建成海外最大军事基地。2015年1月土耳其与索马里就签署了包括在首都摩加迪沙建立军事基地和培训军人等内容的安全合作协议,经过两年多的建设,2017年9月底军事基地正式投入使用,成为土耳其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提升了其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存在。土耳其成为继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之后少数在非洲拥有海外军事基地的国家,并结合经济援建、军队培训快速提升了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

土耳其积极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对地区事务的持续参与,^[14]而积极外交也成为“土耳其模式”和“新土耳其”的三大支柱之一,^[15]土耳其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是其近年来积极外交的延续,土耳其希望借此实现以下

三个方面的目的。首先,通过在地中海、波斯湾、红海—非洲之角这三大关键区域增强军事存在,提升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领导力。近年来,土耳其借助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力量不同程度受到削弱的机会,推动地区战略格局重组,努力推进其地缘位置和战略身份从边缘外围向区域中心的跨越。^[16]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希望发挥地区领导作用,虽然屡屡受挫,但依然不愿放弃这一抱负。在担任伊斯兰合作组织轮值主席期间,埃尔多安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表现强硬,积极与沙特、埃及等其他中东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土耳其的地缘三角战略蕴含着开拓介入地区事务新阵地、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战略意图,通过在三大核心次区域打造战略支点,为在中东发挥影响力、争夺地区领导权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通过在中东地区热点事务中的积极作为和对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的“再发现”构建土耳其的世界大国地位。土耳其在周边地区的外交政策与行动明显受到历史文化因素的推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此也毫不隐晦。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执政后提出“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对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曾经统治的中东地区的关注度大幅提升,梦想恢复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历史荣光。“新奥斯曼主义”着眼于重新发现土耳其的帝国遗产和在国内取得对土耳其多元化而非单一的西方化身份的新共识,以拓展土耳其的地缘战略视野。^[17]从历史来看,东地中海地区曾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波斯湾、红海沿岸大部分地区也曾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和势力范围,土耳其对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的关注,都可以从中找到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子。

最后,将前沿军事存在作为维护土耳其国家安全利益、辐射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桥头堡”。“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局势变动远远超出了土耳其的预期,对其国内安全形势与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别是库尔德问题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土耳其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其国家安全甚至领土完整受到巨大挑战。土耳其希望通过扩大防务合作和军事存在,将巴勒斯坦、叙利亚、卡塔尔、苏丹和索马里等地打造为在东地中海、波斯湾、红海三大关键区域扩大影响力的战略支点和前哨阵地,既可以有力地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可以将影响力拓展至整个中东甚至是非洲,提升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博弈筹码,拓展国际影响力。

三、土耳其中东地缘三角战略的影响

近年来,土耳其的中东地缘战略出现新动向,地区

外交政策议程的安全化与政策目标的刚性特征更为突出。一方面,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高调和强势风格十分鲜明,这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有关讲话和声明之中有明显体现。在巴以问题上,土耳其一直高调支持巴勒斯坦,多次谴责以色列,牵头援助加沙,召集伊斯兰国家共同反击美国的迁馆行动等;在叙利亚问题上推动巴沙尔政府下台,积极支持反对派,直接出兵叙利亚北部;为打击库尔德人势力不惜与盟友美国公开翻脸,并一直宣称要继续向东对库尔德人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高调支持卡塔尔,举行联合军演和部署部队等。另一方面,土耳其也日益不吝于运用自身硬实力,采取积极主动甚或冒险性的军事行动,外交中的军事化色彩浓厚。土耳其的中东外交突破了以往被动介入的特点,经历了从运用软实力到包括军事干涉在内的广泛使用硬实力的演变。^[18]土耳其两度直接出兵叙利亚,在叙北地区建立自己控制的“安全区”,并伺机东进;不顾美国的不满甚或警告,与俄罗斯深化务实合作;派兵进入伊拉克北部,采取军事演习和联合行动绞杀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冲动;与卡塔尔签署协议设立军事基地,在卡塔尔断交危机爆发后加速在卡塔尔部署军队;在索马里建成海外最大军事基地,有意在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与苏丹开展安全合作等。土耳其的地区政策特点鲜明地体现在其在东地中海、海湾、红海—非洲之角这三大次区域的外交政策和行动之中,形成了土耳其特色的地缘三角战略。

在埃尔多安的强势治理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充满了不确定性。^[19]在地区格局高度复杂化和地区大国外交政策安全化的背景之下,土耳其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对地区格局与大国关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加剧了地区形势的复杂化。

第一,土耳其的地缘三角战略加剧了东地中海、波斯湾、红海—非洲之角三个次区域已有冲突的“代理人化”,为中东地区局势和热点问题增添了更大不确定性。中东地区大国的利益纠葛和争相介入使地区国家内部与相互间矛盾更为复杂难解,特别是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肆意地军事介入推动了地区热点问题的阵营化,明显提升了地区冲突的烈度。大国纷纷借助地区冲突,通过设立军事基地、直接军事干预等方式在中东三个次区域展开了日益激烈的争夺,也将地区大国间矛盾直接带入这些区域,加剧了地区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难度。世界大国与地区强国不同层面的利益争端都将叙利亚、巴勒斯坦、也门等国作为演武场,这些地区“火药桶”将承受更多火力。^[20]土耳其、沙特、伊朗等地区大国争相扩大军事介入,并将大国矛盾

投射到地区热点问题之中,往往陷入相互对抗而难以轻易撤出,从而使地区热点问题矛盾尖锐化、冲突复杂化、博弈长期化,成为延续地区乱局的主要助推者。例如,为削弱土耳其和卡塔尔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影响力,阿联酋积极在索马里兰部署军事基地。^[21]沙特也积极拉拢索马里政府,并于2017年1月承诺向索马里联邦政府提供5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受双方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索马里联邦政府处于两难之中:既允许土耳其和卡塔尔在该国部署军事训练基地,又接受沙特和阿联酋的商业援助,以防止后者支持索马里兰和邦特兰的分离主义运动。^[22]

第二,在地区大国多强并立、大国关系出现重组的背景下,土耳其的地缘战略新布局加剧了中东地区大国关系的利益对立和阵营化,并推动各国按照利益而非教派进行力量重组。在中东地区格局变动与地缘政治博弈中,土耳其始终是重要参与者或博弈者之一,其政策变化也显著地影响到地区大国之间的博弈格局。当前,土耳其原本偏向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阵营并保持相对独立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转而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逐步对立;由于巴勒斯坦问题、库尔德问题以及伊朗问题,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再趋紧张;因为卡塔尔断交危机、叙利亚问题等地区冲突而与伊朗出现更多的共同利益。由于现实利益和政策趋同的影响,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不断强化,不仅在叙利亚问题上形成了俄土伊三方联盟,在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形成了事实上的共同立场,甚至对于伊朗国内出现的骚乱,土耳其也对伊朗政府表示明确支持。在沙特和卡塔尔断交危机中,土耳其选择远离沙特,卡塔尔、土耳其与伊朗三国联盟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23]考虑到土耳其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的立场、与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务实合作联盟,以及不断在地区多国设立军事基地和扩大安全存在,沙特、阿联酋逐步将土耳其视为对手甚或敌人,有针对性地开展战略对冲和进行战略对抗。在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看来,土耳其日益站在了伊朗一边而威胁到自身利益,因此对土耳其的警惕和厌恶明显上升,甚至土耳其在红海与非洲之角的军事存在也被沙特等国视为将使伊朗军队在此获得立足点。2018年3月有报道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Mohamad bin Salman)甚至将伊朗、土耳其与极端组织并称为中东地区的“邪恶三角”,^[24]土耳其与沙特、阿联酋等国的关系出现明显恶化,这表明中东地区国家的阵营化日益鲜明,利益对立更趋尖锐。

第三,土耳其的地缘三角战略影响美俄等外部大

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态度与博弈态势。土耳其与美俄关系的亲疏影响到两国对中东格局的塑造力。^[25]在土耳其积极主动、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面前,美俄等外部大国也不断调整对土耳其的政策态度,以平衡各方利益。在重新界定自身定位和“回归中东”的大背景下,土耳其不再将本国的外交政策绑定在 NATO 和西方阵营之中,转而采取更为平衡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突出地表现出与美国及西方的关系疏远、矛盾加深,并与俄罗斯开展务实合作,这在中东地区热点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土耳其亲俄疏美的战略转向极大影响到美俄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平衡,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俄土伊三方联盟使美国处于明显的劣势。相对于密切的土俄关系,土美关系由于一系列分歧而经受严峻考验,特别是在叙利亚曼比季地区和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问题上。^[26]由此,土耳其因素成为影响美俄等世界大国博弈的新变量,这凸显了土耳其的重要地位,促使美俄均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和拉拢土耳其,对土耳其的任性外交政策呈现出更多的默许或纵容,这使土耳其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当然,其与美俄两大国的关系均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四、结语

近年来,土耳其逐步完成了“中东化”和“本土化”的重组过程,战略重心也从美欧向中东转移,“回归中东”的趋势和称霸地区的野心不会改变。^[27]在外交实践中,土耳其将本国安全与地区形势紧密联系起来,其中东外交不仅表现出政策态度上的强硬特征,也日益明显地倾向于使用硬实力,多次采取积极主动甚至冒险性的政策行动,在大国之间游走纵横,在地区事务中强势而为,谋划新的地缘战略布局,以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和提升大国地位。埃尔多安在2017年年终致辞中表示,如果不能解决地区冲突,土耳其也无法获得安全,并将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作为例证;2018年土耳其将实行更为积极、更加大胆和如有必要更具风险的外交政策。^[28]这也总结和预示了当前土耳其的中东外交政策特点。

但应该看到的是,土耳其的中东地缘战略受到自身实力不足、大国矛盾对抗、地区冲突复杂性等众多因素的制约,很多问题均非土耳其所能掌控,因此未来土耳其应致力于巩固既有成果。虽然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但其对自身能力的高估蕴含着重大风险。^[29]作为“超级玩家”的美俄两大国不仅决定着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总体战略态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地区大国外交与军事行动的边界和效果。土耳其在美俄之间的纵横游走也存在重大潜在风险,使之面临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有可能顾此失彼甚至两方落空,对土耳其中东外交战略的效果带来重大影响。

[注释]

- [1] Tamer Fakahany, "Middle East Conflicts Connected by Vying Powerbroker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7,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mideast-conflicts-connected-by-vying-powerbrokers/2018/05/17/c88c95ea-599b-11e8-9889-07bcc1327f4b_story.html?utm_term=.4e2565297313, 访问日期:2018年5月26日。
- [2] [5] 刘中民:《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及其应对》[J],《国际观察》2018年第2期,第40页,第41页。
- [3] 牛新春:《中东酝酿地缘政治新格局》[N],《中国国防报》2017年8月18日,第22版。
- [4] [23] 唐志超:《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J],《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第34页,第35页。
- [6] [18] 李秉忠:《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J],《西亚非洲》2018年第2期,第87页,第93页。
- [7] Aylin Güney, Nazif Mandacı, "The Meta-geograph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Turkey's New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44, No. 5-6, 2013, p.431.
- [8] Burak Bekdil, "Turkey's Love Affair with Hamas", *The Gatestone Institute*, October 19, 2014, <https://www.gatestoneinstitute.org/4785/turkey-loves-hamas>, 访问日期:2018年4月21日。
- [9] "OIC Extraordinary Summit Istanbul Declaration on 'Freedom for Al Qud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urkey, http://www.mfa.gov.tr/site__media/html/oic-extraordinary-summit-istanbul-declaration-on-freedom-for-al-quds.pdf, 访问日期:2018年2月25日。
- [10] "Why Is the Afrin Situation a Threat to Turkey?" *Anadolu Agency*, January 17, 2018, <https://aa.com.tr/en/analysis-news/why-is-the-afrin-situation-a-threat-to-turkey/1033281>, 访问日期:2018年2月26日。
- [11] 刘中民:《库尔德问题成为土耳其对叙利亚政策核心》[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12日,第3版。
- [12] Burak Bekdil, "A Two-and-a-Half-Country Union", *Hürriyet Daily News*, November 5, 2014. "两个半国家联盟"指土耳其、卡塔尔和巴勒斯坦哈马斯。
- [13] Zvi Mazel, "Is Turkey Setting Up a Naval Base on the Red Sea?" *Jerusalem Post*, January 6, 2018.
- [14] Şaban Kardaş, "Turkey: A Regional Power Facing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Turkish Studies*, Vol. 14, No. 4, 2013, p.653.
- [15] 刘义:《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与“土耳其模式”的危机》[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期,第4—5页。
- [16] 王涛:《从高调介入卡塔尔“断交危机”看土耳其的中东战略》[J],《现代军事》2017年第8期,第38—39页。
- [17] Ömer Taşpınar, "Turkey's Strategic Vision and Syr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5, No. 3, 2012, p.128.
- [19] 李秉忠:《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的强势治理及其脆弱性》[J],《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1期,第38页。
- [20] 张楚楚:《碰撞的大国梦和破碎化的中东》,《金融时报》2018年5月21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7647?page=2>, 访问日期:2018年5月26日。
- [21] 自1991年以来,位于索马里北部的索马里兰一直脱离中央政府,处于事实上的自治状态。
- [22] "How the Crisis in the Gulf could Spread to East Africa", *BBC*, April 8, 2018,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43585814>, 访问日期:2018年5月31日。
- [24] Ishaan Tharoor, "Saudi Crown Prince Sees a New Axis of 'Evil' in the Middle East",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8,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8/03/08/saudi-crown-prince-sees-a-new-axis-of-evil-in-the-middle-east/?utm_term=.bd14a4ad7cc9,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0日。
- [25] 郑东超:《土耳其内政外交变动及对中东格局的影响》[J],《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6期,第71页。
- [26] Bulent Aliriza, Zeynep Yekeler, "U.S.-Turkish Tensions in Syria: The Manbij Conundrum", *CSIS*, April 5,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turkish-tensions-syria-manbij-conundrum>,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9日。
- [27] 李亚男:《转向的土耳其:雄心与困境》[J],《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7期,第13页。
- [28] "Turkey Will Continue 'Active and Bold' Foreign Policy in 2018; Erdoğan", *Hürriyet Daily News*, December 31, 2017,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erdogan-hails-turkish-nations-firm-stance-on-jerusalem-in-new-years-message-125015>, 访问日期:2018年2月20日。
- [29] Ioannis N. Grigoriadis, "Turkey's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Vision, Continuity and Reality Checks",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14, No. 2, 2014, p. 159.

作者简介:邹志强,复旦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8-06-19

(责任编辑:张颖)

ABSTRACTS

Special Section

1 Prospects of the Turkish Economy

by Zhang Shuai & Zan Tao

The problem with current studies of the Turkish economy is that they are based on short-term economic data, thus exaggerating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Turkish economy and overlook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rdogan's economic and even political policies. Although the Turkish economy has, since 2014, suffered tremendous downward pressure, there have been many positive developm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long-term data shows that it has seen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erms of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from 1988 to 2017, with the trend accelerating in the Erdogan period. Although Turkey may have certain difficulties in repaying its foreign debts in the short term, it is unlikely to experience a full-scale economic crisis or even slide into the ranks of "failed countries."

9 Turkey'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nd Its Emerging Presidential System: Drivers and Implications

by Li You & Han Jun

After the April 16, 2017 Turkish referendum on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was passed, Turkey now has a presidential system that undoes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1982 constitution, ending its parliamentary system that began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The ruling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 pushed through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primarily to address what it considered to be problems in the parliamentary system such as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ower, frequent changes of government, and weak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new system features a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the presidency, weak parliament, and reduced judicial independence because holding the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simultaneously tends to give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sident's party control of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liament, and indirect control over the judiciary. What emerges is a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a combination of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in presidentialism and the fusion of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s in parliamentarism. It is likely to lead to re-Islamization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consolidate Erdogan's hold on power and AKP's electoral dominance, increasing uncertainty in Turkey's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16 Turkey's New Geopolitical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Connotation, Drivers and Impacts

by Zou Zhiqiang

In the wake of the Arab Spring which has led t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regional conflicts and rivalry and other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urkey has accelerated its "return to the Middle East" to enhance its status as a regional power by implementing a more active, assertive and securitized foreign policy in the region. By intervening in regional disputes, establishing military bases and expand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Turkey has steadily expanded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three core sub-regions of the Middle East: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he Gulf, the Red Sea and the Horn of Africa. It has enhanced its influence in regional affairs and developed a unique strategy emphasizing geopolitical triangles, which has complex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hotspots,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and even great power relations involving the Middle East.